



CDDC计划2007年出书, 稿件征集正在进行中, 欢迎踊跃投稿...

中国政府应如何与西方记者打交道（上）

时间：2002-7-26 22:34:40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秦家骢 阅读476次

主持人（李希光）：今天晚上特别邀请秦家骢先生来作这场报告。秦家骢先生看上去和我年龄差不多，但是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大家就可以猜猜他的经历有多丰富。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养成了剪报的习惯，现在我办公室还放着一摞剪报集子。我今天中午打开这些剪报一看，有好几篇文章是秦家骢先生写的，当时他在《纽约时报》做记者。秦家骢先生早在1965年就在《纽约时报》国际部做编辑，主要负责编辑关于中国的报道。他在《纽约时报》一共工作了10年，他报道中国重大事件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去世，周恩来去世，华国锋继任，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审判四人帮，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他报道的。秦家骢先生还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被中国政府允许到中国常驻的美国记者之一，当时作为《华尔街日报》的首席记者到北京创办《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他离开北京后写了一本书《祖先》关于一个中国家族900年的沧桑史。1987年-1992年，秦家骢作为自由撰稿人曾为《南华早报》、《经济时报》、台湾的《中国新闻》和《日本时报》写每周的政治专栏。1992年他加盟《远东经济评论》，先后作过各个编辑部的高级编辑，1993年-2001年给《远东经济评论》撰写每周专栏《关注亚洲》。撰写有关亚洲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评论。目前每周专栏被刊登在香港的《南华早报》，以及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等国的国际著名报纸上。他撰写的专栏文章刊登在《亚洲华尔街日报》、《远东经济评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客》、《独立报》等国际著名报刊上。除此之外他现任香港亚视国际频道，每周日晚播出的“新闻线”节目的主持人。在节目中他同政治家，政府高官，学者，以及各界人士讨论地方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

秦家骢：我非常荣幸能到这里来演讲，我来以前李教授就告诉我学生们大多数是20几岁，主要在1979年到1983年之间出生的。正好这4年中我在北京当《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今天我准备讲在中国当一个外国记者的经验是什么样的，当然那是20多年以前了。

作为首批来到中国的美国记者，当时中国并不知道如何和外国记者打交道，因为他们不明白记者本身应该是独立的。因此许多人认为我是位美国政府或大使馆工作的，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国记者和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你们可以看到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事件中遇难者是3名记者而不是工作人员。但是在1979年4月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我去外交部见到了姚伟先生——当时的新闻司负责人。他说我可以自由的采访任何人，在中国没有任何人需要通过许可才可以和外国记者交谈。非常不幸的是，我想他可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的人，因为当我想和中国人交谈的时候他们往往拒绝和我谈话。理由是，他们没有得到允许和外国记者说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国际俱乐部——专门租房子给外国人办公使用的地方，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许多国外的大公司企业进入中国，他们需要办公场所。我到那里想要采访国际俱乐部的经理，但是他说他没有得到许可接受我的采访。所以我打电话给外交部新闻司让外交部新闻司告诉这个经理他不需要任何许可，有权利自由交谈。这个经理和外交部新闻司的人通话，同时记下对方的职务、姓名、电话号码，然后他说我现在得到允许和你交谈。这样我的采访才得

- 隐性采访浅论
- 记者的采访心理危机
- 新闻采写需要求异思维
- 新闻由头的内涵与选择
- 对等原则在采访中的运用
 - 于静悄悄处抓新闻
 - 如何采访名人
- 免费采访的味道可好？
- 马屁精采访学（上）
- 名人采访收费该不该
 - 非言语信息采集
 - 专稿的采访

以进行。

因为我为《华尔街日报》工作，因此我对商业和经济报道比较关注。我看到《人民日报》登载一条消息关于一家工厂生产出口产品，我就希望采访这个工厂，遭到拒绝。负责人说你看《人民日报》就可以了，我能说的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肯定是一样的。你们就把《人民日报》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无论我如何解释《华尔街日报》不是《人民日报》英文版，采访最终没能进行。对于事态的发展我也只可以从《人民日报》上得到消息。

当时，外国记者也不能随便到中国的任何地方旅行。我们的办事处在北京，没有得到允许的话，我们不能去天津、上海等北京以外的地方。每次我们离开北京都需要得到外交部的批准。例如，我们希望去上海我可以说因为我希望采访上海市长而如果市长拒绝接受采访，我的上海之行就不可能实现，因为我已经没有了去上海的理由。即使在北京也不是直接可以和被采访人取得联系。原因之一是北京没有公开的电话号码簿，因为所有电话号码都是保密的。所以记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积累尽可能多的电话号码。唯一对我们公开的电话就是外交部新闻司的电话。我们想采访任何人，即使是北京人，都要先给外交部新闻司打电话，安排采访时间。

那时候，我准备写一篇文章关于中国的一位伟大的剧作家，曹禺。曹禺个人已经同意接受采访，因为我私下里是好朋友，我们一起吃过饭、还一起去看戏。但是，他认为还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于是我给外交部打电话提出申请，但是他们的回复很可笑，他们说曹禺拒绝采访。我告诉他们曹禺已经同意采访只是需要外交部的许可，于是他们答应再次与曹禺联系但是结果还是曹禺不想见我。我告诉他们，“明天我还要和曹禺一起吃午饭，他怎么会不想见我？”实际上曹禺接受采访不需要批准，但是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他不敢接受采访。其实外交部新闻司并没有直接和曹禺联系。他们联系北京市外办，然后再由北京市外办联系中国剧协外办，剧协外办才直接联系曹禺。可是，如果在沟通过程中有任何一个环节被拒绝，就会出现以上那种结果。而北京市外办负责人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和曹禺取得联系，但是第二天曹禺告诉我昨晚他接到外交部新闻司的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他回答：“可以，但是我应该如何和《华尔街日报》说话？”可以说，那时候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遇到不少的阻力，每次你申请采访什么人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谁会使你的采访夭折，你甚至不知道被采访人是否知道这个采访申请。我认为当时中国政府阻碍外国记者采访知识界人士是很不明智的。由于难以与这些人取得联系，记者自然只能寻找那些愿意和记者交谈的中国人，也就是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

当时我采访中国人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他们不愿意公开和外国记者接触，即使接受采访他们也更愿意自己坐公共汽车而不坐我的车。那个时候没有定期的新闻发布会，采访是很困难的。那时候在中国也没有那么多的出租汽车，如果要采访，要事先打电话叫出租车来接我。采访的时候，要一直让出租车在门口等候，否则，再叫到车是很困难的。那时候，记者通常都是晚上发稿，我要跑到电报大楼去发稿。我就自己用电报大楼的穿孔打字机打稿子到半夜，那时候，根本就找不到出租车回家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那时候中国很少有定期的新闻发布会，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全国妇联举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提了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中国很多夫妻两地分居，就问妇联领导，中国政府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领导说，中国妇女和你们外国妇女不同，中国妇女不需要男人。

另外一次印象很深的新闻发布会，当时在中国领导层职位最高的女性就是陈慕华，主管计划生育工作。有一次她当选外经贸部部长并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记者招待会。由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主持。在开始之前，陈慕华发表了长达五页的演讲。演讲后，我提了第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接受外国银行的贷款？”她说“谢谢你的问题，下一个。”她又继续让别的记者提问，待全部问题提完后，她说了几句和那些问题全然无关的话，就结束了新闻发布会。还有一次，我报道一个审判异见分子的事件，我来到法庭外面，警察不让进，外面围了好多人。我问一个围观者的职业，他回答是工人。我说，你是国家的主人，为什么不能够进去？工人指着警察说，我不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当时我是首批派驻北京的四名美国记者之一，我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另外两家报纸的驻京记者代表。那时候还不允许外国记者租用老百姓的房子作为自己的家和办公室，只允许我们住在北京饭店。每家报社在北京饭店安排两间房间，一间用于办公，一间用于居住。我住在第四层，第四层分两间房子，一间客房作为办公室，走廊对面的房间是我的卧室。办公室有两张床，我叫服务员把床搬走，他们不同意，他们说这里是饭店不是办公楼。因此，我在北京工作这些年，办公室里一直有两张床。

当时我们都不能直接用新华社的新闻稿，尽管新华社的电讯稿十分重要，而且是向全世界各地发布的消息。而我们要想知道北京的新华社当天发布了什么消息，必须通过我们的香港办公室来获取。原因何在呢？因为当时我们办公室所在的北京饭店，不允许我们安装电传线。后来几家报纸外国记者联合在民族饭店租了一间房子，装了一部电话和电传打字机，如果想看新华社的稿子，我们就打车去那里。

那时候在北京饭店的生活很单调，每天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吃饭，吃饭时间也是固定的，早饭一个小时，午饭、晚饭各一个半小时。在四个美国记者中，我是唯一的华人，长着一副中国人面孔，对我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我站在中国人中间不很特殊，我到曹禹家采访可以不被别人注意，我可以做一些外国人很难实现的事；坏事是由于我长得象中国人，很多中国人不能进的地方我要去就有困难，比如，各国驻中国大使馆，友谊商店，包括涉外宾馆，甚至我居住的北京饭店。尽管我在北京饭店住了将近一年，但是我还是常常被饭店门口的警卫拦截。有一次我去友谊商店，门口有个人要求我出示身份证，于是我也要求看看他的身份证。他问我为什么要看他的身份证，我回答“当然了，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权力来查看我的身份证？”他说他天天都在友谊商店门口，于是我反问他，如果我也天天在友谊商店门口站着是不是就有权查他的身份证了呢？最后他把衣服领子上的“友谊商店”标志翻出来给我看，证明他是友谊商店的雇员。这样，我才把身份证拿给他看。

文章管理: [beyondsun](#) (共计 978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记者打交道

· [中国政府应如何与西方记者打交道（下） \(2002-7-26\)](#)

[>>更多](#)

中国应如何与西方记者打交道（上） 会员评论[共 0 篇]

我要评论

会员名: 密码:

[关于CDDC](#) ◆ [联系CDDC](#) ◆ [投稿信箱](#) ◆ [会员注册](#) ◆ [版权声明](#) ◆ [隐私条款](#) ◆ [网站律师](#) ◆ [CDDC服务](#) ◆ [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